

南宋農村的經濟協調

梁 庚 堯

一、南宋農村的均賦與均役

從戶口的社會結構、土地分配、勞力運用、資本融通以及農產價格的變動各方面觀察，都可以看出南宋農村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富戶的手中，而大多數農家則生活困苦¹。這種貧富不均的現象，無疑會導致貧富的衝突與農村的不安。爲了使農村穩定，南宋政府與民間作了許多努力，以阻止貧富差距的擴大。均賦與均役，即是這些努力之一，目的在革除農村賦役負擔不均的現象，使貧富各按其經濟能力來盡其對國家的義務。均平賦役的措施，包括經界、推排與義役，茲分述於下。

(一)、經界與推排

經界與推排，均爲對地籍的清理，經界必須清丈造圖，推排則僅按圖覈實，較爲簡易。

經界法的施行，目的在均平賦稅的負擔。土地面積是宋代的主要稅率標準，因此徵收賦稅必須有正確的地籍爲依據，缺少地籍或地籍不正，均易造成賦稅的不均。爲求均平賦稅而丈量土地，自北宋以來已經多次施行，王安石執政時曾頒行於全國，稱爲方田均稅法。南宋的經界法，名稱雖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則沿襲北宋方田均稅法而來，以均稅爲目的。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會要）食貨六經界篇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十一月五日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

臣聞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井田之法壞而兼併之弊生，其來遠矣。況兵火之後，文籍散亡，戶口租稅雖版曹尙無所稽考，況於州縣乎？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機巧多端，情僞萬狀，以有爲無，以彊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併，貧者日以困弱，皆由經界之不正耳。

這是經界法的倡議者李椿年的議論，說明由於富家兼併、兵火焚毀及胥吏舞弊等因素，使得地籍不正，賦稅負擔亦由此而不均，貧富差距因而日益增大，李椿年倡行經界法，

¹ 參見拙作：南宋農村戶口概況（載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南宋農村的土地分配與租佃制度（載食貨月刊復刊第七卷第十期），南宋的農家勞力與農業資本（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第五期），南宋的農產市場與價格（載食貨月刊復刊第八卷第八期，第九、十合期）。

目的自然就在解決這些問題。又莊仲方編南宋文範外篇卷二汪應元論經界：

夫版籍不正，經界不均，貧民無常產而有常稅，公家失常賦而有重征，公私之害，甚可哀痛，國家所以經界者，固欲其賦役之平，貧富之均也。

這是南宋晚期臣僚的議論，更直接說明南宋政府所以施行經界法，目的就在使貧富各按其經濟能力來負擔賦稅。經界法的目的，實與富家在農村中的利益相衝突，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李椿年與此後做行經界的官員，均屬於農村中最富有的官戶階層，而據朱熹說：「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黎德靖編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完全是站在全民的立場，不為本身的利益計較。因此，經界法的施行，實代表了部分自覺的農村富家，在政府中推動均賦政策來促進貧富協調。

南宋經界法的施行，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高宗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至十九年（一一四九），由於李椿年的建議而頒行全國；第二個時期是寧宗、理宗時期，各地的地方官作區域性的推行。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李椿年首先建議施行經界法，為宋高宗所採納，至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為止，除兩淮、京西、湖北路、福建漳、汀、泉州、廣南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四川瀘、叙、渠、果州、長寧、廣安軍外，南宋全國各地均普遍施行²。施行經過與內容，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以下簡稱朝野雜記）卷五經界法條有簡要的敘述：

經界法，李椿年仲永所建也。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仲永為兩浙轉運副使，上疏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場戶虛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不息，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賦偏重，故稅不行。」十一月癸巳，疏奏，上納其言。仲永又言：「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士人，其餘皆欺隱也，請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推之天下。」因上經界畫一，其法令民以所有田，各置帖基簿，圖田之形狀及其畝目、四至、土地所宜，永為照應。即田不入簿者，雖有契據可執，並拘入官。諸縣各為帖基簿三，一留縣，一送漕，一送州。凡漕臣若守令交承，悉以相付。詔專委仲永措置，遂置局於平江。……十三年（一一四三）六月，詔頒其法於天下，仲永亦遷戶部侍郎。十五年（一一四五），仲永以憂去，命王承可（王鈇字承可）以戶部侍郎代之，承可請員外郎開封李朝正同措置，又請令民十家為甲自陳，不復圖畫打量，即有隱田，以給告者（原注：正月辛未）。承可罷，朝正權戶部侍郎（原注：十六年〔一一四六〕二月丙寅）。十七年（一一四

²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五：「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始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舉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檣抗疏論不便，於是瀘、敘州、長寧軍並免，渠、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

七)春，仲永免喪，復故官，專一措置經界（原注：正月丁卯）。仲永復以結甲自陳爲不便，令州縣造圖而遣官覈實，先成有賞，慢令有罰。十九年（一一四九）冬，經界畢。

可知李椿年所主持的經界法，主要內容爲丈量土地，繪圖置簿，分別儲存於轉運司及州、縣。李椿年一度因丁憂去官，王鈇改其法爲結甲自陳，其後李椿年免喪復官，仍然恢復清丈繪圖的方法。經界法的施行侵犯了富家的利益，難免受到富家的阻力，各地有施行中輟的情形³，但在實施完畢的地區，確實收到均稅的效果。如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書：

至如經界一事，……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

同上卷一百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闕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

朝野雜記卷五經界法條：

諸路田稅由此始均。

均對經界法大加讚揚。可知在地籍正確之後。賦稅不均的情況有很大的改善，但由於勢家兼併、胥吏舞弊的情形不會因經界法的施行而消失，因此經界法也不可能將賦稅不均的情況完全革除。李椿年推行經界法既確實收到均賦的效果，遂爲此後南宋地方官所奉行。福建漳、汀、泉三州在紹興年間未行經界，福建轉運判官王同於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知漳州朱熹於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先後請行，但都爲勢家阻擾而罷⁴。至寧宗

³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九月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應詔言：「蜀中經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己之私，而形勢戶之不願者爲多，蓋詭名挾戶，非下戶所爲。蜀人之至東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吏與富民爾，其貧乏之徒，固不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願者之說獨聞，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又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農田篇載宋高宗言：「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爲不善，今諸路往往中輟。」

⁴ 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卷一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冬條：「初，紹興之經界也，漳、泉、汀三郡以何白旗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止不行。然漳、泉富饒，未見其病，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因有計口科鹽之事，一斤之鹽至出數斤之直，論者患之。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四月，福建轉運判官王同代還，入見，言其病不專在鹽，請先行經界，壽皇是其言，以同爲戶部左曹郎官，往汀州措置，未至官，有武臣提刑言其不便，遂止之。是歲，朱熹守漳州，復以三州經界爲請。熹初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到任，會臣僚有奏請行于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適與熹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以至方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不行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是多，得旨，本州先行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熹益講究，冀嗣歲可行。而寓公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皆不便，爲異論以搖之，後遂有進狀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不行，卒如所料云。」

、理宗時期，由於紹興經界歷時已久，地籍發生混亂，賦稅不均的情形愈見嚴重，於是又有區域性的經界法實施，如台州、婺州曾於嘉定年間（一二〇八—一二二四）施行，常熟縣、華亭縣曾於端平年間（一二三四—一二三六）施行，信州、常州、饒州、嘉興府曾於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施行⁵，對各地賦稅不均的情況均應有所改善。

宋末景定（一二六〇—一二六四）、咸淳（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年間，為清理地籍，又施行推排法。按宋代推排一詞，原指州縣每隔三年依民戶家產的增減而升降其戶等⁶，但宋末所行的推排，則為簡易的經界法，依據原有的圖籍，核對土地的面積、所有者與賦稅，加以釐正，原圖籍散失者，才重新丈量。其施行的情形，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農田篇載咸淳元年（一二六五）監察御史趙順孫言：

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畝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亦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

按寶祐二年（一二五四）曾行自實田，隨即因臣僚反對而罷⁷，趙順孫所說的自實，當

⁵ 陳耑卿嘉定赤城志卷十三版籍門一：「按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李椿年侍郎建行經界，……今七十有五載，猾胥豪民，相倚仗為蠹，賦役龐亂，遂有舉行前說者焉。往歲寧海、黃巖嘗行之矣，臨海、仙居則方行而未備也。」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農田篇：「知婺州趙鼎大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惡夫報罷，士夫相率請於朝，乃命趙師鼎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鼎為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為貧下之戶，實田隱為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創庫櫃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顧清正德松江府志卷六田賦志上楊瑾經界始末序：「經界，仁政之始也。邑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矣，簿書漫漶，賦役煩擾，豪民猾吏，始則相與為蠹，中則相與為姦，其極也，則產去者賦不除，力竭者役不止。……端平改元（一二三四），聖天子更新大化，勤恤民隱，郡國守宰部使者莫不精白承休，以惠利為急。瑾雖不肖，亦獲承流下邑，修經界，清版籍，行之二年，戶無難征之賦，里無破產之役。」杜範清獻集卷十六常熟縣版籍記：「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逮今未百年，舊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考，胥吏舐口腹，養妻子，其間朝覲尋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不田者有之，重以潁江水囓與抵罪而沒於他司者，日侵歲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為苗七萬二百石，為稅若和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督于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削面，取之點合，利擅貴豪，細民禁抑莫訴，下困上迫。……端平初元（一二三四）秋八月，王君實領是邑，問民疾苦，皆似然寔額，以賦役不均告，會府徵修復經界，……於是考舊額，還衆役，按紹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縣五十都，都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為覈田簿，號模其形為魚鱗圖，而又稟官民產業于保為類姓簿，類保都鄉于縣為物力簿，經始於端平二年（一二三五）之夏，訖事于其年之多。」宋史卷一七三上食貨志上一農田篇：「（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是歲，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

⁶ 會要食貨六九版籍篇紹興二十二年（一一五二）二月七日左宣義郎大理評事王彥洪言：「切見甲令所載，三年一造簿書，於農隙之時，令人戶自相推排，欲別貧富，升降戶等。」同上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二月二十二日新差權發遣全州楊揆劄子言：「在法人戶家產物業每三歲一推排，陞降等第。」

⁷ 宋史卷四〇九高斯得傳：「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興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悅，即為之罷。」

即指此而言。又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農田篇載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司禮卿兼戶部侍郎季鏞言：

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畝步，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訖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綜趙順孫及季鏞所言，可知宋末所行的推排法，是以紹興及嘉定以來經界所建立的圖籍為根據，重新核訂田畝、賦稅，以防止漏稅的情形發生，最初行於平江府、紹興府及湖南三處，其後由於季鏞的上疏，才「詔諸路漕臣施行焉。」（同上）推排法的用意，與經界法相同，但由於宋祚將終，地方行政日益敗壞，奉行官吏非操之過急即怠弛不行，似未收到與經界法相同的效果⁸。

（二）、義 役

義役是南宋民間為減輕差役負擔而結合的互助組織，最初純粹由民衆自動結合而成，其後得到政府的贊助，為之推廣，並常在財政上給予支援，於是逐漸普遍起來。參加義役者按經濟能力的高低共同負擔執役的費用，排列役次及接受補助，富家負擔起較大的責任，中下戶則可免於破產之患，發揮了均役的作用。

義役起源於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婺州東陽縣長仙鄉的民衆組織，乾道四年（一一六八）范成大知處州之後，將義役推廣至處州，又上疏朝廷請頒其法於全國，於是義役逐漸在各地實施，並演變出各種不同的形態。東陽的義役，是因當地的富家有感於役職的繁重，常易引起爭訟，為共同分擔役費而組成的互助組織，發起人與參加者都是當地的大姓⁹，因此尚未有協調貧富的作用。范成大於處州推行，才將義役改變為貧富戶

⁸ 劉黻蒙川遺稿補遺載其上於咸淳四年（一二六八）二月的經界自實疏：「臣聞經界，仁政之先務；推排，經界之畫一。……奈之何猛者務必深切於行，而寬者付之悠悠而不行，均之為失朝廷之本意，遂使貧民下戶，日困於抑轡，而豪民猾吏，亦得以相蒙為奸，於是州縣之賦額十不存六七，唯從事於巧立名色，重催預借，以應解綱，而怨悉歸於公上。」

⁹ 呂祖謙東萊集卷七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是鄉也，蓋有人焉，其姓名字曰汪灌慶衍，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吾鄉之人，非父兄，即子弟，顧闕於役，驕恣弛義，為耆老羞，職是鬻競者追胥科徭之譴耳。率為里正，一歲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儕盡自實其貲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寡金以界當役者，役之先後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日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仰給於衆，尚何憚？』衆雖然稱善，即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煩也，則衆割田百畝與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

均包括在內的組織。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一范成大神道碑：

（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十二月，起知處州，……四年（一一六八）八月至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前婺守吳侯義之，為易鄉名，揭碑褒勸，爾與之鄰，獨無愧乎。」民既感謝，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信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甲乙相推，遠至二十年，諸邑競倣之。

可知處州松陽縣民爭役，范成大勸諭民衆倣效東陽縣的組織，依貧富出資買田，以租入助當役者，並由民衆自排役次，而松陽縣組織成功之後，處州其他各縣也爭相倣行。此後范成大於乾道五年（一一六九）、七年（一一七一）兩次上疏朝廷，建議推廣義役於諸路，朝廷從其所請¹⁰，於是義役與差役並行。義役推廣之後，除原有由民衆共同備置田產，以田租補助執役戶的方式外，又發展出另外幾種形態。程洵尊德性齋小集卷二代作上殿劄子三：

蓋今義役之約，雖所至不一，而其大要有二，有分歲月而人自為之者；有哀其費而衆募人為之者，於哀費之中，又有二焉，或使之出田，或使之出粟。

所謂「分歲月而人自為之者」，如朝野雜記甲集卷七處州義役條附德興義役：

先是，我先君子（李舜臣）為饒州德興宰，奉詔舉行義役事，乃令民以田之多寡為役之久近，如多者役二年，少者不過役三月。

所謂「哀其費而衆募人為之者」，如程泌洛水集卷七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與為役者，因其貲產之高下，哀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

又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德興義田記：

德興明卓君始按民產高下，各使出穀，名曰義莊，募人充戶長。

南宋史料中，程洵所說的第一種方式較為少見，而以第二種方式為多，無論那一種方式，役戶負擔都視其貧富來決定。義役之所以能用來救差役之弊，是因為原由一戶獨自負擔的役費，分由衆戶來共同負擔。而民衆所出的田產錢穀，無論用來補助執役戶，或

其副於家，歲三月，鄉衆咸會，擊豕釀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自紹興己巳（一一四九）迄今幾三十年，西山役訟不至於公門，往歲郡守吳公希嘉君之為，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八吳希神道碑：「知婺州，……常患差役不均，欲勸民為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吏與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¹⁰ 會要食貨六六役法篇淳熙十年（一一八三）十月四日臣僚言：「義役之說，起於乾道五年（一一六九）五月范成大奏陳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自相要約，各出田穀以助役戶，永為義產，總計為田三千二百餘畝，乞行下諸路州軍令縣官依此勸誘，至七年（一一七一）正月，成大為中書舍人，再述前請，朝廷從之。」

用來募人充役，實際上都只是王安石募役法的變相。義役施行也難免有許多弊端，甚至有與原意相違的情形出現，但由於確有協調貧富的作用，因此直至南宋晚年，施行之處甚多¹¹。

富家與政府，在南宋義役組織中都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他們主動的負擔起經濟上的責任，減輕了中下戶的差役負擔。前述各種形態的義役，其役期的長短或出資的多寡都按資產的高下來決定，自然富者負擔較重，而中下戶負擔較輕。富家又經常主動的捐助錢穀或田產，倡導義役，以促進農村中貧富的協調。周南山房集卷五陶宣義墓誌銘：

君有業于華亭之海隅，海隅差役重，有田者輒破，相與爲隱寄而已，君創義役，弭爭端，窒賂謝，吏失望悵然，則惟豪右，撼之于有勢。君不私一家，患一鄉，反傾補罅，瘠己贏人，凡十年義役得不破。

尊德性齋小集卷三迪功郎致仕董君行狀：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朝廷念里胥之役不均，許以義役從事。君家無溢格之稅，而里多中下戶，慮不能集，即出田粟倡之，事遂定，鄉里賴以少紓。

黃震黃氏日抄卷九十七餘姚孫一元墓誌銘：

歸而撫其族，……益修學諭公所結義役，銖積其餘將，別置班并代下戶。

都是富家爲減輕中下戶的差役負擔，而主動出資倡導義役的例證。此外，如黟縣程叔達，「剖私田倡義役」（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五程叔達墓誌銘）；施宿知餘姚，勸民義役，茅宗愈「亟捐膏腴數十畝倡之」（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二茅宗愈墓誌銘）；而黃巖趙處溫、趙亥兄弟一家，雖因趙亥登進士第而免役，仍然積蓄原來參加義役田產的田租，先後購田三百畝爲義役莊，以供鄉之役費¹²。可見逃避差役的富家固多，但也有不少富家自覺其對社會的責任，熱心出財協助鄉人減輕差役的負擔。地方政府對義役的組成，

¹¹ 胡太初重廣緒論差役篇第十：「朝廷主張義役，自處、婺舉行，馴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爲便。昔有持狹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爲均適，而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哀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管掌，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宜勸勉爲之。」

¹² 陳鍾英等光緒黃巖縣志卷六版籍志徭役篇載趙處溫義莊田後序：「義莊之設，爲義役計也。吾都囊病於役，規弊百爲，互相糾結，甘蕩於訟而不顧，良可哀也已。陳君（名汝）告院來宰吾邑，下令勸諭隨戶產割田以爲義役，自相推排，自立要約。……仲氏登丙戌第，謀於予曰：『役可免也，田可歸也，其如義何？蓋圖之以爲永久計，可乎？』予善其言，歲課其入，積二十餘年，置田二百畝，乃捐廢址，建義莊。……會令尹王公華甫至，憫時孔艱，用濟於役，役必鳩田，田必入莊，規新憲刻，立兩主事，以司出入，俾予督之，予素有志者也，故受命不辭，畢力經理，會計儲費之贏，別買田百畝，總前所捐田，得三百畝，田與費當，則以所鳩田歸其主，鄉之公科私遺悉取諸莊，爲利豈淺淺哉。」同上趙亥義莊田跋：「重役之苦，人均患之，吾家以亥忝貴顯，幸而獲免，伯氏用是以舊日入役之租，歲積月累，買田置莊，與衆共之，至二十餘年而義莊成。」

也有很大的貢獻。自朝廷接納范成大的建議之後，義役多由地方官來推行，地方官爲使義役能够順利組成，常對財力不足的民衆給予財政上的補助。樓鑰攻媿集卷九十六孫逢吉神道碑：

授袁州萍鄉縣，……邑之西北，土瘠民窶，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義役。

王懋德萬曆金華府志卷九役法篇寶慶義役法條：

知婺州魏豹文、王夢龍相繼奏行義役，隨役戶田畝之數而通計之，約雇役費用之需而均率之，都各有田而不拘於煙爨，田各有助而無間於鄉都，以義勸民，量其多寡，出助田產，以爲役費，其不應差役小民，則不在勸率之數。又慮其事力單寡，承應不繼，則撥官田及給官錢買田以助之，各都分釐爲三等，上等事力有餘，無待於助，次則酌中助之，下等助之加厚。

正德松江府志卷六徭役篇楊瑾義役始末序：

繼承臺府之命，俾糾義役，瑾遂得畢力經紀，幸而就緒。大概糾錢置產，永蠲苗稅，名曰官田，民歲收租，俾充役費，名曰義莊。既又免差稅長，併令雇募。間有鄉保不堪糾役者，官自置田，以其稅代之。

可知地方官對較爲貧乏地區的民衆，常爲之購置役田，以供役費，使義役能够順利組成。地方政府的這種積極態度，與富家的主動提供役產相同，使中下戶免於受重役的壓迫。而部分地方官爲恐義役田產將來爲不法的役戶占據典賣，喪失役費的來源，更進一步由政府來管理義役田，將其畫入常平官產¹³。義役田產在政府有制度的管理下，自然較能持久，而義役也因此不再是純粹的民間組織，政府在其中所擔任的角色愈形重要。總之，在富家的自覺與政府的贊助及監督下，貧富階層用互助合作的方式，解決差役不均的問題，富家、政府以其財力協助中下戶減輕差役的負擔，貧富之間因差役而產生的衝突自可緩和。

二、南宋農村的貧窮救濟

貧窮救濟是南宋政府與民間協調農村貧富的另一項努力。無論平時或災荒，都有若干富家，或出於自動，或在政府勸諭下，對農民施以各種救濟，使缺乏糧食的農家能够

¹³ 盧鎮重修琴川志卷六敘賦義役省割：「據申本縣九鄉五十都，今管義役田地共五萬五百二十二畝一角五十八步五尺五寸，收租米麥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六斗四升一合，……其田並係常平物業，不許公私典賣，亦不許移易轉換，違者按法坐罪，業還義役莊，錢沒官。其助田之家，將來富者不加增，貧者不許取，入仕而免役者不給還，有家道倍進樂然添助者聽，有驟富而素不助田者量助。」正德松江府志卷六田賦篇上楊瑾便民省割：「內北九鄉勸到田地蕩總計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畝，南四鄉勸到田地蕩總計一萬三千一百二畝，其錢或係官司給錢贖到，及人戶立契，永賣離業，本縣已將契書（按：原缺二字）及將產簿（按：原缺一字）鑿（按：原缺一字）充常平義役官產，他日不許役戶盜賣執復，亦不許官戶指射妄佃其業，亦不許復於名下抱租。」

維持生存，不致於受高利貸與糧價變動的壓迫。同時，南宋農村中又新創有社倉，由地方政府或富家提供資本，以低利貸給農民作農業資本或生活費用，使救濟貧窮的措施由臨時性進而變為制度性。

南宋富家厚取利息及操縱物價的情形固然常見，但也有許多富家，存心仁厚，於米貴時減價出糶，借貸常蠲除本利，遇災荒則發廩賑濟或煮粥以食餓者，使農家能在艱困時得到接濟。若干富家，平時即經常以平價糶米，借貸不取利息，甚至蠲除本金。洪邁

夷堅甲志卷七查市道人條：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

黃瑞台州金石錄卷十一宋王復墓誌銘：

每歲多春之交，出穀減價以濟，名曰潤糶。

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卷二十張端弼行狀：

君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概，恥為俗子富。…

…每歲之春，發廩以賑窮民，質貸踰年，不取其息，有負債者，多折券不復問。均為富家平時救濟貧窮的例證。而文天祥在吉州的鄉里中，諸富家每年例行接續賑糶，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五與吉州江提舉萬頃：

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

這說明不僅是個別的富家平時從事救濟貧窮的工作，而且同一地區的諸富家彼此合作，共同來改善農民的生活。若逢災荒，地方政府必會勸諭富民賑糶，而部分富家也會主動的救濟災民，宋代政府勸諭富民賑糶，懸有賞賜官爵的賞格¹⁴，固然在賞格的吸引下，

¹⁴ 會要食貨五九賑恤篇乾道七年（一一一七）八月一日條：「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切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受名目。無官人一千五百碩，補進義校尉，廩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二千碩，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碩，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碩，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如係選人，循一資；二千碩，減三年磨勘，如係選人，循兩資，仍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碩，轉一官，如係選人，循兩資，仍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與推恩。武臣一千碩，減二年磨勘，陞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碩以上，取旨優與推恩。……』詔依，其賑糶之家，依此減半推賞。……」詔江南東路、荊湖北路依此制。」同上乾道八年（一一一七二）八月條：「權發遣隆興府興茂良言：『本司觀諭上戶出米賑濟、賑糶，緣所立賞格比尋常勸諭計之，其直不啻過倍，又有運載之費，欲更少加優異。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閏二月十九日指揮，進納迪功、承信郎並理為官戶，內迪功郎與免試，先依注授差遣，依奏蔭人例；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並免試弓馬及短使，先次注授差遣。今來觀諭賑濟告勅元降指揮，係敦尚義風，即與進納不同，見得事理尤甚，雖各係理選限及先與添差本路合入差遣，緣許理官戶一節，及將來到部免試，先次注授依奏蔭人例等事，未嘗立法。吏、戶部看詳，欲將承信郎比附承節郎，上州文學比附迪功郎，依條選注授蔭人差遣，餘並依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十九日已降指揮，仍比擬進納已降指揮，理為官戶。』從之。」

可使富家開廩賑糶，但不爲所動，閉廩不發者亦復不少¹⁵，賑糶的進行，仍有賴於富家自覺其對災民的責任，在鄉里中主動倡導。朱文公文集別集卷六與黃商伯述及他在南康軍勸諭富家救災的情形：

勸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三縣共得穀十萬斛矣。

衛涇後樂集卷十七故安康郡夫人章氏行狀：

平居自奉簡素，周人之急常恐不及。……歲飢，里閭艱食，則發廩，損市直，以倡巨室，全活甚衆。

誠齋集卷七十三劉氏旌表門閭記載貢士劉承弼的善行：

嘗屬年饑，道殣相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振之，不受一錢。富者予於是翕然化之，無復遏糶者。

洪咨夔平齋文集卷三十一吳孝先墓誌銘：

歲大饑，道殣相枕，發私廩爲粥以食餓者，巨家相率致助，全活不可計。又明年，穀騰躍猶故，盡出伏臘之儲，損直以糶，爲鄉里先。

都是先有一富家主動倡導，其他富家才受其影響，隨之賑濟。樂善好施的富家在農村中可能爲數不多，但他們的義舉卻能產生很大的感化作用，有利於農村中貧富的協調。富家在災荒時救濟飢民的事蹟，見於南宋文集中者尚多，不及一一列舉，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吉州永新縣的富家，每遇災荒，合作進行賑恤，各家分任不同的職責。文忠集卷七十二譚宣義墓誌銘：

廬陵統八縣，永新爲大，西界湖湘，壤沃地偏，民生自足，間遇水旱疾疫，凡邑之大家，分任賑恤之事，某家發廩，某家給薪芻，某家藥病者，某家瘞死者，以是流殍稀鮮。

這種情形，與前述文天祥鄉里諸富家每年例行接續賑糶相似，富家共同擔負起濟貧的責任，所發揮的作用自然較個別進行更大。由於農村中有許多富家負起救濟貧窮的責任，另外一些惟利是圖的富家對農民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自必受到抑制。若干地區，竟能在春夏或災荒時，不受米價變動的影響，民生與平日無異¹⁶，不可說不是受這些自覺其責任的富家之賜。

¹⁵ 參見拙作：南宋的農產市場與價格（下）（載《食貨月刊復刊》第八卷第九、十合期）。

¹⁶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八常平劄子：「去年之旱，飢民所在擾擾，郡士人鄭如閔者，頗富，前此捐金儲米，自去歲七月置籍而糶，止收元價，鄰里鄉黨賴以贍給，所居閭門一二千家，嬉嬉如平時，獨無貴糶飢窘之憂。」方大琮《龍庵集》卷二十一與項鄉守：「水南有新惠安余令薦鶚者，收甲其鄉，歲歲平糶，而宗族鄰里之價不敢甚高，今春詔處微警，而此境帖然者，余力也。」真德秀《文忠公文集》卷一浦城勸糶：「陽和二月初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間，斯人極憔悴，殷勤問原來，父老各長喙。富室不憐貧，千倉盡封閉。只圖價日長，弗念民已弊。……行行至平洲，景象頓殊異。白粲玉不如，一升纔十四。問誰長者家，作此利益事。父老合掌言，子文姓陳氏。起家大姓也，時甚饑，願先。」

南宋農家生活的改善，除依賴富戶臨時性的救濟外，又有制度性的社倉，對農家作積極的協助。宋代以救荒為目的的倉儲，原已有義倉與常平倉，分別用於賑濟與賑糶，但二者都設於城邑，對農家的幫助有限，南宋又新創用於賑貸的社倉，設於鄉村，易於發揮濟助農民的功用¹⁷。社倉之制，一般雖認為創始於朱熹，而實淵源於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二者同為一種以抑制農村高利貸為目的的農貸措施¹⁸；而在朱熹創設社倉稍前，朱熹同門魏掞之於紹興（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間已有類似的作法，朱熹所立的社倉，大略倣效魏氏的規模，僅在貸放收息的方式上小異，二人且曾討論彼此的優劣¹⁹。乾道四年（一一六八），朱熹於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創立社倉，因行之有效，至淳熙八年（一一八一），上疏請推廣於全國。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筭四：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一一六八），鄉民餓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多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多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

¹⁷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遠谷力穡運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袁燾絜齋集卷十洪都府社倉記：「常平義聚於州縣，而社倉分布于阡陌，官無速運之勞，民有近糶之便，足以推廣常平賑窮之意。」

¹⁸ 討論青苗法與社倉之關係者，已有辜瑞蘭：青苗法之變動（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三冊）。

¹⁹ 王柏魯齋集卷七社倉利害書：「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掞之字元履）。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倣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為小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紹興（一一三一——一一六二）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以踵前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廩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饑饉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警警而訖不能以相詰。」

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

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

可知朱熹所推行的社倉，目的在以低利貸米給農民，其貸放方法，是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當息米累積到相當數量之後，不再收取息米，僅收耗米三升。社倉的貸本雖然最初由政府或富家資助，但是當息米累積到相當數量之後，就以息米作貸本，原來的貸本歸還政府及富家，而這些息米原為借貸的農民所納，可以視為農民自己的儲蓄，因此，社倉法可以說是協助農民儲蓄，以解決農民本身的困難。至南宋晚期，社倉遍布全國，而亦演變出不同的形態。劉宰漫塘文集卷二十二南康胡氏社倉記：

今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行，與所聞於他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

可知各處社倉在組織與經營形態上互有不同。若以經營形態畫分，則南宋社倉可分為「貸而不糶」與「糶而不貸」兩類。前者沿襲朱熹之法，而其中又可分為幾種，如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一社倉條引宜春志載萍鄉知縣孫逢吉所創的社倉：

遇春夏散借，至冬收斂，入息三分，歉歲收二分。

這是每年例行貸放，償納時須附加利息，歉歲利息稍減。如楊簡慈湖遺書卷二永嘉平陽陰均隄記載溫州社倉：

不計息，遇饑歲併蠲其本。

這也是例年貸放，但不收利息，歉歲連本錢也可以蠲免。如黃氏日抄卷八十七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載黃震改革後的廣德軍社倉：

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貸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貸之而不復收息。這是僅於荒年貸放，不收利息，以社倉田產的田租代替利息來維持社倉貸本。後者則為倣效常平倉的經營方式，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冬則增價而糶，以備來歲。

如傅增湘輯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十六度正巴川社倉記：

為錢一千緡，歲得穀三百石，登熟則以價糶之，擇一人以掌其穀之數；期月穀價暴貴，細民不易，則收二分之息而糶之，以濟貧弱，以平市價。

都是採用平糶的方法。由於若干社倉採用平糶的方法，可知社倉不僅有抑制農村高利貸的作用，而且兼有抑制富家操縱米價的作用。

富家在南宋社倉組織中，就如同在義役組織中一樣，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魏談之、朱熹創設社倉時，雖然貸本借自常平司，但二人當時身分都是鄉居官戶，未在政府中任

職，因此社倉的創立固然是由政府所支持，而其創立動機則出於農村中最富有的階層。朱熹在請求推廣社倉的奏疏中，建議社倉貸本除由政府支借外，並可由富家捐助，於是此後富家響應其議，出私財以設立社倉者甚多。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有深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父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

同上卷八十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五年，一一九四）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

漫塘文集卷十回知遂寧李侍郎：

某區區之跡，於棄官時，生理薄甚，二十五六年間，朋友相資，某亦力勤苦節，年來衣食粗給，又以其餘率鄉之好事者，因淫祠之已廢，創社倉，厥初得米僅二千三百碩，行之數年，今五千餘碩矣。

同上卷二十二南康胡氏社倉記：

伯量喜而言曰：「……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得穀六百斛以貸。……越二十年，迄於今，合本息二千斛。……」

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十六武寧田氏希賢莊記：

武寧田君倫德彝與兄佐德賢，從子可簡元行，偕其族之子弟，采二先生之意，立法以濟鄉里。斂穀六百石爲貸本，號希賢社倉者，希晦庵也；率楮六萬緡爲羅本，號希賢義廩者，希西山也。

以上各社倉，或創自一家，或創自一族，或創自衆人，而其貸本自數百石至數千石，均出自富家主動的捐助，說明富家自覺其社會責任，樂於以多餘的財力協助農民改善生活。南宋學者所撰的社倉記，多自儒家民胞物與及仁民愛物的思想立論，批評貧富不均的不合理，而以社倉爲有助於均富²⁰，最足以反映富家的自覺，也說明了儒家思想可作

²⁰ 黃幹勉齋集卷十九袁州萍鄉縣西社倉聚矩堂記：「韓聞之師曰：聚，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田連阡陌而餘粱肉，貧者無置錫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制，輟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聚矩之方也。君子之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處乎其中，均稟天地之理以爲生，民特吾兄弟，物特吾黨與，則其林然而生者，未嘗不方也。」宋代蜀文獻存卷七十六度正巴川社倉記：「人與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同於一理，均於一氣，故君子以爲人者，同胞之兄弟；而物者，相與之儕輩也。視之如兄弟，則必親之，而有相友之義焉；視之如儕輩，則必愛之，而無畧殄之失焉。知此則知所以爲仁，知所以爲仁，則知所以仁民

為貧富協調的思想基礎。

南宋政府對社倉的貢獻，與富家相同。社倉之初創雖出自民間，而實有賴常平米的支持。朱熹上疏建議推廣社倉，論及貸本來源，亦以常平米為主。此後富家出私財設立社倉者日多，而地方政府並未因此放棄其職責。許多地方官員，或支借米穀，或節縮經費，致力於社倉貸本的建立。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

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一社倉條引南康志：

南康軍社倉：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江東常平使李申奏，知南康軍趙師夏撙節泛費，贖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儲以為社倉之用，所宜主張成就，且以風示他郡。

絜齋集卷十一洪都府社倉記：

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縣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連江寧陶君武泉、幕友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茲事，廩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

眞文忠公文集卷十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叨蒙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早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概悉倣朱熹所上條約。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五劉洙墓誌銘：

宰黃岡，邑無孔錢粒粟，公銖寸積累，糴穀數千斛，立社倉，民賴以活。均為地方官員創立社倉的例證。由於地方官有行政權，又有籌集經費的能力，所以創設社倉亦較富家容易。富家常須數家才能設立一社倉，而地方官一人常可設立許多社倉，最明顯的例子，即上述眞德秀於潭州以穀九萬五千石設社倉百所。根據朱熹推廣社倉之議，用政府經費設立的社倉，應仍由地方士人參預管理，如上述常州宜興縣社倉及南

而愛物矣。仁之為道，用之一鄉不為不足，用之一國不為有餘，所施益博，則濟益衆，顧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則為仁政，在下面而行之，則為仁里，里仁之所以為美者，非以其有無相調，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故耶。」雪坡舍人集卷三十六武寧田氏希賢莊記：「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為天地之心，必能流暢天地之生意，然後俯仰無愧。先儒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仁也者，蓋天地之生意，凡天地間，何物非我，一物不遂其生，吾心數矣。士君子之生斯世也，達則仁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里，能仁其鄉里，苟達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諸人所論，多引張載、朱熹之言，可見宋代理學對農村貧富協調的影響。

昌、新建二縣社倉，均是如此；真德秀於潭州所設的社倉，則「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真文忠公文集卷十申尚書省乞撥和羅米及回羅馬穀狀）政府的管理權力較大，但亦未排除地方人士於外。因此，社倉貸本即使出自政府，仍然具有部分民間組織的性質。

在富家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社倉確實發揮了協調貧富的作用。農民由於有社倉的協助，不致於受高利貸與米價變動的壓迫，經濟能力為之提高，即使遇到災荒，也不必依賴臨時的救濟，農村亦因此而得到安定。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放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觀其利。

即說明這一事實。社倉對改善農民生活的貢獻，可再用建寧府與潭州在有無社倉兩種情況下的不同現象來說明。建寧府是最早設立社倉的地區，但後來因管理不善，而一度停止貸放，在設立社倉以前、社倉正常經營及社倉停止貸放三段時期，建寧府的治安狀況有顯著的差異。勉齋集卷十八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為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吝施，米以五六升為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隕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其禾，閭里為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為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十（按：十當作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為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稻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規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多少歉，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為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

可知建寧府農民在未設立社倉之前及社倉停止貸放之後，必須忍受米價高漲的痛苦，無法忍受時則只有起而規糧；而在社倉發揮作用的二十餘年間，農民於春夏乏糧時獲得社

倉的貸借，生活無憂，富家也從而無法操縱米價，鄉里因此平靜無事。潭州十二縣中，僅長沙縣於慶元（一一九五—一二〇〇）初年設社倉二十八所，其他諸縣都沒有社倉，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潭州發生災荒，長沙縣與其他各縣的情況遂有所不同。眞文忠公文集卷十申尙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今春艱食，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戶皆預貸穀，賴此得充種糧，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創始於慶元初年，迨今二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可知長沙縣農民因有社倉的貸借，在災荒時期仍能不缺種籽與糧食，而其他各縣農民則因沒有社倉的協助而生活窘迫。建寧府與潭州的事例，清楚的說明了社倉的存在與否，直接影響到農民的生活。因此，南宋社倉雖如眞德秀所說「不能無弊」，但只要行之得法，無疑對農村貧富的協調有很大的幫助。

三、南宋農村的家族互助

家族制度對南宋農村的貧富協調也有很大的貢獻。同一家族，祀奉共同的祖先，因而具有出於一源的共同意識，基於此一共同意識，族中富家常對貧困的族人給予特別的協助。家族中的貧富相恤，除臨時性的濟助外，又有制度性的義莊，以田產爲經濟基礎，依一定的規矩對族人作經常的贍給。義莊制度起源於北宋，至南宋而愈益普遍，成爲維持農村安定的重要力量。

同族聚居與族中有貧富的差異，是家族互助的基本背景。同族聚居，始易維持家族的共同意識，也始易了解族人所遭遇的困難，而無論臨時濟助或經常贍給亦均僅能潤及鄰近的族人，遠居者顯然無法顧及。中國歷代都有同族聚居的風俗²¹，南宋亦然，農村中常見同一族姓聚居於同一村落，甚至以族姓爲村名。平齋文集卷十於潛洪氏譜系圖序：

聚族天目下，以東洪名其村，無慮六七十家。

夷堅乙志卷十五水閘條：

樂平縣何衢里，皆程氏所居。

夷堅丙志卷十二饒氏婦條：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

夷堅支乙卷一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者，皆管氏所居。

²¹ 清水盛光：支那家族の構造，頁二四五～二四八；清水盛光著，宋念慈譯：中國族產制度考，頁一二二～一二五，列舉自漢至唐及明、清的例證甚多，獨缺宋代的例證。

夷堅支戊卷二葉丞相祖宅條：

葉子昂丞相宅在興化仙遊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居一村。

夷堅三志辛卷六牛頭王條：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

夷堅三志己卷十葉氏七狐條：

德興縣外五里一邨落，名朱家關，葉氏聚居之。

魯應龍閑窗括異志：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

均為同族聚居的例證。其中於潛洪氏聚居於東洪村，信州永豐縣管村所居者皆管氏，婺源畢村全為畢姓所居，閑窗括異志所述及的楊墩村左右皆楊姓，都是以族姓為村名；而洪族聚居於東洪村者有六七十家，葉族聚居於興化仙遊縣同一村落者多達百餘家，族派均甚繁盛。同族雖然聚居，但族僅是共同祭祀的單位，營共同經濟生活的基本羣體則是家。南宋也有所謂累世同居或同族共爨的情形²²，家、族合一，以族營共同的生活，可是這僅是特殊的現象。聚居的同族既可達數十家或百餘家之多，而各家營個別的生活，經濟狀況自然會有所不同，尤以宋代社會趨向平民化，沒有世族存在，富貴貧賤時相升降²³，族中各家的經濟狀況甚至會有顯著的差異。攻媿集卷六十范氏復義宅記：

衣冠之族，不免饑寒者甚衆。

充分說明這種現象。因此家族中有貧富相恤的必要。

南宋富家以其餘力濟助貧困族人的事蹟甚多，而若干不甚富裕之家，基於同族之誼，也不落於富家之後，以有限的財力為族人解決困難。富家濟助族人的事蹟，如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二十萬世延行狀：

尤善宗族，每先其急難，遇長幼慈愛均壹，無纖芥嫌隙，族衆多，間有違言，君周旋其間，開釋以理，衆皆媿服，協比如初，由是闔族內外咸欽而愛之，稱為長者。善治生，蓄而能散，親故有不振者，每綱紀其家，其弟子有美質，困不能自業者，給飲食師資費以教之，處女貧無以歸，躬為擇配，匿而遣者凡數人。

²² 施宿嘉泰會稽志卷十三義門條：「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為士，或為農，鄉黨稱其行。大中祥符四年（一一〇一），用州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一一二〇—一一二四）初，又五六世矣，猶如故，聚族亦加於昔。」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七：「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不著撰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十二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十二月條：「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母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周必正墓誌銘：「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

²³ 趙彥衛雲麓漫抄卷一：「本朝尚科舉，顯人魁士，皆出寒賤。」袁氏世範卷二世事更變皆天理條：「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

同上張端弼行狀：

君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概，恥爲俗子富，務周旋宗族，親舊有以窘告，濟之無難色。

同上賈如訥行狀：

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務兼併，而生產日富，性仁慈，尤睦宗族，見貧者，心憫之，常發廩以濟，每言「彼吾宗也，吾忍獨溫飽也？」有尤窘者四族人，以膏腴三十畝賑之，仍給穀暨牛，資其播殖。

葉適水心集卷十七胡崇禮墓誌銘：

餘姚之胡，岡連壟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恤，墮枝落葉，亦使自存。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十四陳益之父行狀：

家累百金，……伏臘之外，悉用振業族黨鄉閭之急難。

都是富家周恤貧困族人的例證，或濟助族人生活，或教育族人的子弟，或贈予族人嫁女的妝奩，或更供給族人生產所需的土地與資本。此外，又有一些樂於濟助族黨的善人，本身並不很富裕。劉一止苕溪集卷五十宋故右朝請大夫鄭君墓表：

遇宗族鄉黨甚信且厚，居長興時，有宅一區，田一頃，在歸安之璉市，僅足了伏臘，即徙焉，捐其先居之產，悉以與族人。

水心集卷十四姜安禮墓誌銘：

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調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

鄭君與姜安禮，家境都非十分寬裕，與前述富甲鄉邑或家累百金之家有所不同，而皆能調濟族人。可見在家族的共同意識影響下，即使族中沒有甚富之家，家族制度仍然能够發揮互助的作用。

義莊制度的盛行，使家族互助能够有更廣泛而長遠的效果。家族的臨時互助，在宋代以前行之已久，而義莊則爲北宋新創的制度。宋代是中國家族制度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新家譜學的興起，族長的選立，祭法的講求及祭田的設置，均發生於此時²⁴，義莊的設置，也是這新發展中的一部分。

義莊之制，創始於北宋范仲淹，繼爲他族所倣效，推行日廣，成爲構成中國家族制度的一個基本要素；而范氏義莊本身，自北宋中葉創始之後，延續近九百年，尚仍存在²⁵，其意義的深遠，於此可見。范仲淹出身孤寒，入仕後好施與親舊，而且已有志於

²⁴ 參見清水盛光：支那家族の構造，第二章第二節宗族（宗教の家族）の殘存。

²⁵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重修范氏家乘，載有范氏義莊自宋至清的演變詳情，此書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國內未得見，至爲可惜。又據日人天野元之助於民國二十八年於吳縣的調查，范氏義莊尚仍存在。利用范氏家乘對范氏義莊的研究，已有清水盛光著，宋念慈譯：中國族產制度考；近藤秀樹：范氏義莊の變遷（載東洋

義莊之創立，及至貴顯，祿賜有餘，才於慶曆（一〇四一——一〇四八）、皇祐（一〇四九——一〇五三）間，逐次於蘇州吳、長洲兩縣，置產千畝，設立義莊²⁶。其創設動機，據范文正公集附錄年譜所載：

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以來，積德百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

可知范仲淹所以設立義莊，贍養宗族，是由於他自覺宗族無論親疏，都源出於同一祖先，富貴者對貧困的族人有經濟上的責任。范氏義莊對族人的贍給，有一定的規矩，這一規矩爲范仲淹於皇祐二年（一〇五〇）所訂立，此後至南宋雖曾多次增訂，但所增者多爲防止弊端的規則，於贍給方式則少有增改。茲據范文正公集附錄義莊規矩錄范仲淹初定規矩於下：

-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卽臨時加折（原注：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卽不支衣。
-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爲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原注：七十七陌，下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

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四號）；Denis Twitchett,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 1050-1760*（載 David Nivison and Arthur Wright, ed., *Confucianism in Action*）。

²⁶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錄褒賢祠記卷二錢公輔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莊，以養濟羣族。……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同上附錄義莊規矩清憲公奏續定規矩：「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諡文正臣仲淹，奮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自慶曆（一〇四一——一〇四八）、皇祐（一〇四九——一〇五三）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族。」

並依諸房例給米絹並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一〇五〇）十月支給逐月餼糧並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一〇五一）以後，每一年豐熟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餼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羅貨，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羅貨，回換新米椿管。

可知范氏義莊的贍給方式，是計口逐日支米一升，每歲支衣一疋，喪葬嫁娶皆有補助，贍給對象以居於蘇州的族人為主，鄉里外姻親戚如確有急需，也酌量予以濟助。以每口逐日支米一升而言，即已解決了成人一日食米需要量的一半。因此，在義莊協助下的貧困族人，經濟情況自必大為改善。范文正公集褒賢祠記卷二劉渠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載南宋范氏族人范之柔言：

先祖所創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指，雖甚寒者賴以無離散之患。

說明了義莊所發揮的長遠作用。而義莊對周恤族人，所以能够發揮臨時濟助所無法發揮的長遠作用，實因義莊有固定的田產作永久的經濟來源。

義莊雖創於北宋，但至南宋時期始成為社會上一普遍的制度。范仲淹創立義莊後，置田產以贍養族人的措施即逐漸為當時人所倣效，北宋的家族義莊，見於記載者尚少，除范氏外，僅吳奎、韓贇、向子諲及劉輝數族而已²⁷；至南宋日漸普遍，見於記載者有三十餘族之多。茲列舉南宋義莊的創始人、分布及規模如下表：

²⁷ 參見清水盛光著，宋念慈譯：中國族產制度考，頁三七～三九。

創始人	分 布	規 模	資 料 來 源
范仲淹	平江府吳縣、長洲縣	三一六八畝	范文正公集附錄朝廷優崇嘉熙四年（一二四〇）與免科羅
畢叔玆	平江府	四〇〇畝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一畢叔玆通判義莊記
錢佃	平江府常熟縣	不詳	重修零州志卷八敘人人物
張湜	鎮江府	四〇〇畝	漫塘文集卷二十一希墟張氏義莊記
陳稽古	鎮江府	一四一畝	漫塘文集卷二十三洮湖陳氏義莊記
鍾頤	鎮江府	不詳	漫塘文集卷三十一鍾頤墓誌銘
趙希澗	衢州	不詳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五安撫殿撰趙公墓誌銘
趙德掾、趙崇	衢州信安縣	一千斛	景定嚴州續志卷五建德縣救荒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建德縣賑糶本末
樓璿	明州鄞縣	五〇〇畝	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卷八畫錦樓氏義莊記
余晦	明州鄞縣	不詳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一桓溪全氏義田記
全汝梅	明州鄞縣	不詳	同上
孫椿年	紹興府餘姚縣	不詳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孫椿年墓表
陳德高	婺州東陽縣	一〇〇〇畝	萬曆金華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陳德高傳
呂皓	婺州永康縣	不詳	同上呂皓傳
謝子暢	台州	不詳	林逢吉輯赤城集卷十二趙著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石子重	台州臨海縣	不詳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閻騫	建康府	不詳	茗溪集卷五十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誌銘
張燾	饒州德興縣	不詳	文忠集卷六十四張燾神道碑
王剛中	饒州樂平縣	一〇〇〇畝	孫觀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八王剛中墓誌銘

郭 蒙	臨江軍新淦縣	二〇〇畝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孫 逢 辰	吉州龍泉縣	不 詳	文忠集卷七十四孫逢辰墓誌銘
江 燾	建寧府崇安縣	不 詳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三江墳墓誌銘
熊 如 圭	建寧府建陽縣	不 詳	劉倫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八熊氏義莊記
劉 淵	建寧府建陽縣	不 詳	游九言默齋遺稿卷下建陽麻沙劉氏義莊記
林 瑑	福州福清縣	一〇〇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直秘閣林公行狀
陳 居 仁	興化軍莆田縣	二〇〇畝	攻媿集卷八十九陳居仁行狀
方 大 琮	興化軍莆田縣	三五〇石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十二莆田方氏義莊規矩序
趙 葵	潭州衡山縣	五〇〇〇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二趙氏義學莊
孫 堪	江陵府松滋縣	不 詳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九孫仲卿墓誌銘
施 揚 休	成 都 府	二〇〇畝	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一成都施氏義田記
張 浚	漢州綿竹縣	不 詳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下張浚行狀
祝 可 久	不 詳	不 詳	徐元杰樸菴集卷十一刺史祝公贊
鄭 興 裔	不 詳	不 詳	文忠集卷七十鄭興裔神道碑
江 氏	不 詳	不 詳	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立繼類命繼與立繼不同條

上列南宋義莊，除范氏義莊創於北宋外，其餘都創立於南宋，分布於兩浙、江東、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諸路，僅兩淮、兩廣未見有義莊的記載，可以說是幾遍全國；其規模則小自百餘畝，大至五千畝，因各創始人經濟狀況的不同而有差異，而范氏義莊於嘉熙四年（一二四〇）已擁有田產三千餘畝，較范仲淹初創時擴大很多。

南宋義莊的田產來源，大多與北宋范氏義莊的創設經過相同，贍給方式也多沿襲范仲淹所訂立的規矩，但都有若干新的演變。以義莊的田產來源而言，范仲淹創設義莊，是以俸餘購置田產，南宋義莊的設立，多仍由士大夫在仕宦之後，以俸祿之餘購置田產，如閻騏、張燾、樓璣、林瑑、趙葵的創設義莊，均是如此²⁸。但也有若干義莊的創

設人未曾仕宦，其購置田產的資金顯非取自俸餘。如渭南文集卷二十一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祀，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

按陳德高舉進士未第，非仕宦者。又同上卷三十九孫君（椿年）墓表：

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有詔例補獄祠，君辭焉。……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爲常。

按孫椿年雖補特奏名而辭官，亦非仕宦者。可知南宋義莊不僅行於仕宦家族，未仕宦者只要能力所及，也捐助田產以贍宗族。又有若干義莊田產，並非來自購置，而是來自先人的遺產。文忠集卷七十鄭興裔神道碑：

榮公將終，分以餘資，公辭曰：「叔父素恤宗族，願立義莊，贍南北眷。」至今賴之。

這是自動放棄繼承遺產，以之設立義莊。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立繼類命繼與立繼不同條：

今欲照上條帖縣委官將江齊戴見在應干田地屋業浮財等物，從公檢校抄割，作三分均分，將一分命江瑞以繼齊戴後，奉承祭祀，官司再爲檢校，置立簿曆，擇族長主其出入，官爲稽考，候出幼日給江淵，不得干預；將一分附與諸女法，撥爲義莊，以贍宗族之孤寡貧困者，仍擇族長主其收支，官爲考覈，餘一分沒官。

按宋代戶絕律，戶絕之家若無在室、歸宗或出嫁女，則以其財產三分之一給繼子，三分之二沒官；若有出嫁女，則以三分之一沒官，其餘三分之二由繼子與諸女均分²⁸。江齊戴死後戶絕，而又無女，政府處分其遺產，以三分之一給繼子江瑞，其餘本應完全沒官，但政府只沒入其三分之一，而以所餘三分之一比附與諸女法，撥爲江氏一族的義

²⁸ 荅溪集卷五十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誌銘：「（賀駿）平居不植產，族聚浸廣，仰食者衆，泊爲治杭中，得圭田之租，卽以給族長，俾置田鄉里，次第給之。」文忠集卷六十四張燕神道碑：「又追先志，斥俸餘爲義莊，贍宗族。」攻媿集卷七十六跋揚州伯父耕織圖：「伯父（樓璣）……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直秘閣林公（瑑）行狀：「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儲之，更五任，得千緡，置義田百斛，以贍貧宗。」同上卷九十二趙氏義學莊：「至忠肅公（趙方）而族益蕃，忠肅公既貴，欲倣范文正公置義田以厚其宗而未果，及丞相衡公（趙葵），世載勤勞，致位二府，慨然曰：這言在耳，吾昔與二兄謀共成先志，不幸二兄奄忽，今非吾責乎？」

²⁹ 參見徐道鄰：宋律佚文輯註（收入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集），戶絕法，命繼分產條。

莊。平民設置義莊與義莊田產來自遺產，均反映南宋義莊設置普遍的趨向，田產來源不拘限於以俸祿之餘購置，而可採用多種方式。尤其是政府處分江齊戴遺產的例子，戶絕田產可由政府撥為家族義莊，更足以說明義莊之設已成風俗。以義莊的贍給方式而言，南宋范氏義莊仍然沿用范仲淹初訂的規矩，而其他新設的義莊也以其為模倣的對象³⁰。因此，范仲淹所訂的規矩，實際上可同時說明南宋一般義莊的贍給方式。但南宋也有若干義莊，其贍給對象僅限於貧困族人，與范氏義莊逐房計口贍給不同。文忠集卷七十四孫逢辰墓誌銘：

嘗慕范文正公置義莊，贍宗族，買田北鄉，以歲入給貧者伏臘吉凶費，市藥療病，買棺送死，衣寒食饑。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為善，嘗以田二頃為義莊，周貧族人，以為猶用公平日之意也。

樸菴集卷十一刺史祝公贊：

又為義莊，族之貧者計口給粟，衣其寒，藥其疾，殮其死，皆親視之。

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一桓溪全氏義田記：

草創於宋徵士菽和府君諱汝梅，……既絕意當世，乃草創義田條約，仿諸家之例，其貧者計口計日而給之，婚嫁喪葬各有助。

以上各義莊都僅贍給貧困的族人。贍給範圍的縮小，同樣反映義莊設置普遍的趨向，創設義莊，不必等待大貴之後，經濟基礎稍優的衆人，將贍給範圍縮小，亦可設置。總之，南宋義莊的各種演變，均反映出其普遍的趨向，而無悖於范仲淹創設義莊的精神，在這種情形下，負擔起濟助貧困族人的責任者愈來愈多，受惠者自必愈來愈廣，而家族制度所發揮的協調貧富作用也就愈形顯著。

³⁰ 斐然集卷二十一成都施氏義田記：「遵文正公舊規。」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十二莆田方氏義莊規矩序：「於是取范公遺法，依倣而行。」攻媿集卷八十九陳居仁行狀：「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婣。」同類資料尚多。